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

徐伯昕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诞生较早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1932年7月1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分别成立于1935和1936年。

三家书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1948年10月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三家书店完全合并之前，在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三家书店的同人长时期地同甘共苦，互相砥砺，培育了团结战斗的良好基础。回想起当年的战斗岁月，使人胸怀激荡，感奋不已。

患难兄弟 同心协力

三家书店在初创时期，由于各自发展的过程和主观条件不同，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三家书店的性质和目标，从根本上来讲是相同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三家书店所致力出版事业，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旧社会的条件下，推进革命文化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斗争中必然会遭到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打击，遭受到许多无可避免的困难和牺牲，因而三家书店在他们一诞生之后，就成了同命运的患难兄弟。

三家书店在诞生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而外，相同的最大

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新知书店在创办时用“募股”方式凑集了六、七百元，生活书店当时曾投资一千元。记得1930年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时，只用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这样开展了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费用，可以算是白手起家。到新知、读书两家创立的时候，生活书店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业务上也粗具规模了。

三家书店之间的互助合作，有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工作上的相互帮助。在初期主要是工作上的互助合作。新知书店创立初期，还没有设立门市部，所出图书完全委托生活书店总经售，这是抗战前在上海时的情况。抗战爆发后，三家书店由上海迁到汉口，党的长江局决定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在国统区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印行，此事交由新知书店全权办理。事实上，新知由于人手的关系，中国出版社出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交生活书店印行的，新知印刷的部分也委托生活总经售，这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三十多处分支店。

后来，新知书店大力发展分店，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汉口撤退前后，新知和生活两家都在浙江金华、丽水设立了分店，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据点。由于这个地区离两家总的管理机构所在地——重庆较远，两家分店的同人同舟共济，共同应付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横加迫害，最后一同安全转移，前去曲江等地开辟新的工作，有的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初期，三家书店同时在大后方增设了许多分支店。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

卫戍区宪兵、国民党特务借口检查，到各家书店门市部任意查抄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投寄的邮包被扣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几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宣部又实行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所有这些，引起了三家书店负责人的高度警惕，并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生活书店主要创办人邹韬奋同志为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会议上，接连提出提案，据理力争，虽两次提案都在会议上获得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却蛮横无理，对决议置之不理。在这两次斗争中，三家书店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动员和团结了一批新闻出版同业发表声明热烈支持，作为后盾，在舆论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口撤退后，三家书店负责人齐聚重庆。开始，生活和读书两家租赁的办公处同一条巷内。这样，三家书店负责人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并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期的碰头制度。我代表生活，黄洛峰和徐雪寒代表读书、新知。每次碰头不拘形式，有对形势的分析，有相互的情况通报，有对共同有关问题的商讨，有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研究对策，等等。这种不定期的碰头制度，一直持续到1941年皖南事变。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由徐冰同志和三家书店负责人经常联系。

遭受惨重打击 向敌后开展工作

1939年4月21日‘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查封，同月27日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全被洗劫一空，甚至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经理周名寰被拘捕，后移送集中营，因受严刑迫害并患病，不幸在集中营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的被封，是国民党反动派将对进步书店采取法西斯镇压的信号，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

文化出版方面提早下的毒手。六月十二日就发生了平江惨案。

从1939年4月21日到1940年4月5日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书店有十六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九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三家书店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生活书店第一批十六处分店受到摧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五十六处分支店，除五处是因战局关系撤退外，又有二十多处被摧残，这时全国仅仅剩下六个分店。1941年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六个分店中的五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读书和新知也遭到同样的恶运。最后，三书店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保留性的措施。

可是，在任何压力、威胁和诱惑下，三家书店同人人都没有屈服。相反，越是在艰险的环境里，大家斗争的意志越是昂扬，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革命出版工作继续下去。

1938年12月，读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在谈话中，毛主席谈到：“……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谈话时，有谷军在座，他把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庆。谷军即生活书店较早去延安的杜国钧同志。

大约是1940年的初夏，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作出的具体安排。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三书店于当年九月中，即派干部李文（生活）刘大明（读书）王华（新知）等前去华北晋东南抗日根

根据地开设了华北书店。于十月又派柳湜、徐律、赵冬垠等去延安建立华北书店。当时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缺乏印刷设备，只能用蜡纸刻写和有光纸复印，把大本书籍分册印成小薄本子发行。根据地的战士、干部得到一册，如获至宝，争相传阅，直到纸张破损，才肯放手。

在延安，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出版了许多书籍和小学课本。这是三家书店合力去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最早的先遣队。后来，在邹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1940年秋季，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挺进苏北，在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海地下党为配合苏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大量输送干部和革命青年去苏北。同时与三家书店驻沪人员商量，抽调干部王益、袁信之、张汉清等先后前去积极开展建店和出版工作。先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以后又在苏中四分区和苏北盐阜区设立大众书店。苏中四分区大众书店后来也改名为韬奋书店。苏北距离上海较近，三书店曾先后以不同形式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统一担负同苏北的联络工作，因而，苏北根据地的出版工作，由于有后方不断的供应支援，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久。

皖南事变之后，三家书店的中心遵照党的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徐雪寒先去上海，后来进入苏北。黄洛峰和我同去香港。为使进步书刊能大量地向南洋各地和其他海外地区发行，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两家合作开办了一个光夏书店，负责人冯克（景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战火中光荣牺牲。新知书店开设了南洋图书公司，负责人吉少甫。生活书店原有香港分店的设立，在这以前遭国民党特务压迫结业。这时，光夏书店、南洋图书公司和一家由原来生活书店几个同人集资筹设的星群书店，接替了生活书店香港

分店的工作。当时，韬奋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文艺刊物《笔谈》，连同以上几家书店出版发行的进步图书，对港澳，南洋各地以及其他海外地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9年到1941年，是三书店在国统区同受惨重打击，实行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出版工作基地的时候，也是三书店部分联合的开始。

扩大团结 坚持斗争

三书店遭受惨重打击之后，将中心转移香港，这并非是消极的回避斗争，而是为了更便于指挥调度三店在敌后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在三书店总的管理机构撤离重庆之前，遵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些紧急部署，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抗战以来的三年多内，生活书店的力量比较暴露，因而考虑在国统区应当化整为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首先把精干的力量和组织机构掩护下来。然后根据情况，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出版工作。

化整为零的具体做法是：更改名称，变换方式，化名自营，或者寻求合作对象，实行投资合营。当时办了一批小型的，有些是专业性的出版社，如学艺出版社、三户图书社、国讯书店等。也办了一些和出版工作有关的中小型工商企业，如三户、建华等印刷厂，重点经营纸张运销的光华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等。这样一些工商企业，为图书出版的原料供应，印刷制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提供了条件。

从皖南事变以后，到解放战争胜利，生

活书店在重庆、桂林、上海等地办的化名自营和投资合营的出版机构，以及和出版工作有关的贸易运输机构，共有三十多个。三家书店在以上三地加上桂东、广州、北平办的相同性质的机构，总计有四、五十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我和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分手之前，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情况，并于1942年8月我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周恩来同志着重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严格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的出版机构是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则偏重于出版理论性书籍和现实抵触较少的书籍；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更加稳重隐蔽的作法。在沦陷区和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区，也都按照这三条战线的原则部署。为使革命出版工作能够在敌人统治的地区内长期坚持，分三条战线作战，是三家书店共同遵守的原则。

1943年秋，我由桂林转往上海，一直到抗战胜利，就留在上海工作。

1944年5月，日寇向我湖南、广西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这时，苏德战争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苏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德国法西斯力量被全部歼灭。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不利。国统区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普遍地不满，重庆、昆明、成都等城市掀起了广泛的民主运动，公开的提出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这一时期，以黄洛峰同志为首的三书店留渝同人，包括薛迪畅、方学武、诸度凝、孙洁人、仲秋元、岳中俊、吉少甫、万国钧、范用、唐登珉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重庆的书业界，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在文化出版方面推行的

高压政策，展开了攻势。

1943年，以三书店为核心，联系了二十多家政治态度比较进步的书店，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消息。接着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被推选为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任总经理。于1944年5月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联营书店，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书店作斗争。一方面反对垄断印书用的土报纸配售额和不合理的印刷费用的涨价，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要求保障小书店的利益。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五月三日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文化界提出的取消审查制度的要求，有些惊皇失措。开始仍然采取搪塞拖延的办法，九月四日由蒋介石在参政会声言要修订出版物与新闻检查标准，想用这一空洞的诺言应付过去。文化、出版、戏剧界看出这是一种欺骗花招。中间经过多次的斗争，1945年9月，重庆、成都、昆明文化出版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齐心合力地发动了一个拒检运动，即主动不让审查。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形势，内心虚弱，这年秋天不得不被迫宣布于十月一日起废止图书新闻检查。这虽然是一个局部的胜利，但是，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的胜利，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

胜利更加鼓舞了斗争的信心。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除重庆之外，还在成都、西安设立了联营书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继续在武汉、广州、上海、北平等地，设立了联营书店。团结的书店从二十多家，增加到五十五家。除了联营书店，在重庆和上海还成立了出版业联谊会，同国民党把持的旧书业公会进行较量。团结面更加广泛。1947年，在上海，为争取进口白报纸的配售额以及免征营业税，曾几次派代表团去南京，继续同

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御用书店和国民党把持的旧书业公会，越来越孤立，国民党反动派更被广大人民所唾弃。而三家书店在党的领导下，在出版界的骨干作用越来越显著，为出版界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全面联合 迎接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部首先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开始正式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招牌。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同人，闪电般地进行了复店工作，生活在吕班路（现重庆路）开设了门市部，同时成立了编辑、出版部，还请郑振铎先生主编了《民主》周刊。读书、新知也很快恢复在上海印书，以供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知不久也在四川路开设了门市部。三书店的领导中心又集中到上海。由于三书店的共同努力，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都大量印行，陆续和收复区的读者见了面。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上海除了生活、新知的门市部，还新辟了若干新的据点，如化名自营的骆驼书店，专印世界文学名著，还合作办了一个华夏书店，偏重出版解放区的图书。三书店更进一步合作，在北平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长沙办了兄弟图书公司。

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政协决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对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加紧了压迫。这时，人民解放军和大批干部由各条路线进入东北。三书店也派干部邵公文（生活）吴毅潮（读书）沈静芷（新知）等先后去胶东解放区，陆续在烟台、大连设立了联合机构光华书店。并在大连创办了光大

印刷厂，大量印书。胶东和大连解放地区的工作开展，都得到当地党政方面的大力扶助和经济上的支持，因而业务上发展很迅速。在解放区第一次印行了《资本论》和《鲁迅全集》等巨著。后来，又在哈尔滨建立了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基地，供应北满的需要。到东北全区解放，在大连、安东、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城市都设立了光华书店，还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区管理处。东北所出版的图书，不仅供应东北一个地区的需要，而且曾一度成为华北几省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一些新解放城市的主要货源。如果三书店不及早派遣一部分干部去山东和东北解放区，如果没有当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扶助和经济上的支援，我们的出版工作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适应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7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三书店急速派遣干部毕青，欧建新，张炜等一同到石家庄，筹划在长江以北的新解放城市设立分店。1948年12月，在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书局。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就以石家庄为基点，相继在济南、徐州、开封成立了同一名称的书局。天津、北平解放后，又分派干部在两地成立了新中国书局，从此，在华北地区打开了新局面。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变本加厉地施加压迫。五月底重庆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元被逮捕，关押进渣滓洞。反动派看到重庆三联书店的同人并未因经理被捕而表现退缩，又派特务到书店抢书，还声称要继续捕人。这时，重庆三联书店不得不停业。仲秋元经多方营救，于重庆解放的前夜获释。

在抗战胜利前的上海，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公开的敌伪宪兵、军警，实际上是互通声气、互相勾结的。三家书店为了保存革命出版工作者的有生力量，所采取的组织形式

和斗争方法，是坚决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上海沦陷以后，生活书店立即租赁店面以远东图书公司名义继续工作，后来暴露了又改为兄弟图书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书店已不能继续存在，就把原有的门面改成合资经营，名为新光百货商店。可是，以上海为基地的贸易运输工作，不但没有被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所注意，而且工作越干越发达。从皖南事变以后，三家书店都安排了一定的干部力量从事贸易运输工作，先后开辟了从上海到湘、桂，从上海到苏北、胶东、东北解放区的运输线。到临近全国解放时，还开辟了从香港到大连、到天津的运输线。贸易运输工作，对增加经济收入，度过难关，积累资金，准备恢复书店，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协助解放区解决紧缺物资的供应，做了较有成效的工作。三书店从事贸易运输工作的干部有陈其襄、张锡荣、王泰雷、冯舒之、汤季宏、曹健飞、陈树惠、唐泽霖等，他们经受风险，备尝艰苦，对革命出版工作的保存和发展尽了最大的心力。

1946年秋季，内战全面展开，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海外的广大读者，并便于和解放区联系，三书店的领导中心于1947年秋季再一次转移到香港，对解放区的布局设店，分派干部，调度货源，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积极为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做了许多准备。

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三书店全面彻底合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0月2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推选黄洛峰为临管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经理，沈静芷、万国钧为副总经理。1949年四、五月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平，后来，决定于8月15日起取消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统一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三书店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参加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三书店自己也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著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爱护，没有在党领导下的三书店工作人员的坚强团结，斗争就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今天，我们不是纪念三书店的功劳，而是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出版事业方面所建立的伟大功绩。

重庆三书店联合时，曾发表告同人书，其中指出：“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在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三联书店这一革命出版事业永葆革命青春。

一九八二年三月修改于庐山